

故土与流亡

70年前的冬天,保罗·策兰(1920-1970),这位20世纪卓越的德语犹太诗人,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逃离。与1945年春天抵达此处时的情形相似,除了自己的诗稿和零星几本书以外,他随身携带的唯有关于父母和故国的记忆。

7个月后,策兰辗转到达巴黎。他的半生都处在这种逃亡状态中。或许从集中营里无数个痛苦绝望的夜晚开始,策兰就下定决心,离开那充斥着恐怖气氛和悲伤回忆的国度。记忆中魂牵梦萦的童年与家乡,在纳粹杀害父母的枪声中消失殆尽。

策兰原名保罗·安切尔,出生于被称为“小维也纳”的东欧城镇切尔诺维兹,这里曾是奥匈帝国的属地,1918年主权划归罗马尼亚,1944年后则变成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的领土。除了地理和主权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动之外,该镇的文化也很多元,德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意第绪语等汇聚于此。这里,孕育了策兰丰富而复杂的心性,然而,战争的趋近与强权的挤压,令犹太人感受到了重压下的窘迫,同时也将策兰逼到了现实边缘,世界之大,却无处容身。

故土灾难深重的包袱过于沉重,超越了许多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不止一次,策兰切割自己的回忆。离乡背井的一刻,他甚至失去了回望缅怀的勇气。直到后来,他才用诗歌和语言,敲开记忆的坚冰,以诗行作为一种刻记,不断叙述,从而复活自己宽广无垠的生命内涵。

策兰:死亡与遗忘的对赌

■秦 烨



保罗·策兰

死亡与黑暗

1942年,在纳粹的肆虐蹂躏下,策兰的父母相继于集中营丧生,历尽艰辛后,诗人的内心无疑在这块死亡之地长久地徘徊。对于劫后余生的策兰来说,与死亡相处的经验,为他筑起一座坚固的城墙。

在这个过程中,策兰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裂变:一方面,作为灾难的“幸存者”,与死亡擦肩而过,死亡在经验生活和文本世界中不断涌现,甚至向他发出召唤;另一方面,“对死者的认同”以及对死亡的直面,又使他不得不承受死亡逼迫式的追踪,由此而形成的精神境况又深刻地主宰着他的诗歌,造成“无言与难言”中的不得不言。

诗歌《数数杏仁》中前面几句这样写道:“数数杏仁/数数杏仁,/

等佐料。除此之外,杏仁还带有浓重的犹太意识,以色列人往往有杏花、杏仁等图章,意第绪语中也曾有童谣诸如“葡萄干与杏仁”,《出埃及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等。短短几句诗行中,蕴藏着丰腴的文化沉淀和精神厚度,这在策兰以前的现代诗歌中并不多见。

接下来,策兰在《数数杏仁》的后半段中写到:

你全部进入的名字才是你的,坚定地走向你自己,锤子在你沉默的钟楼自由摆动,无意中听见的够到你,死者也用双臂搂住你,你们三人步入夜晚。让我变苦。把我数进杏仁中。

在痛苦的灵魂漂泊与隐忍的诗句炼造中,策兰不断流浪,又不断地回到生命的原点。布加勒斯特、维也纳、巴黎,这些他停留过

的城市仅仅是短暂休憩的中途港,那颗历经奥斯维辛之殇的犹太人的心灵始终无处安放。人生对策兰而言,无异于一场艰辛而漫长的逃亡之旅,永远找不到出口。日复一日的时光在他笔下变成艰涩深邃的诗行,他的语言风格日趋简短破碎,每个词藻背后仿佛都藏着一个无法破译的隐喻,死亡和黑暗成为盘旋在诗人内心世界中挥之不去的暗影。

诗歌与灵魂

1945年4月,策兰在流亡布加勒斯特之际,完成了饱受赞誉的《死亡赋格》初稿,并于该年5月发表在罗马尼亚文的刊物《同时代》上。在这首见证和勾勒死亡的诗歌中,策兰写下这样一句:“当黄昏降临到德国,你的金色头发呀,玛格丽特”。当历史之夜幕骤然降临,策兰饱含悲郁的诗歌语言,顿时具有了一种探射的功能,发出金色的光芒,洞穿时间,凝视死亡与黑暗。

“诗歌是一种语言表现形式,并通过对话表现其本质。”策兰将诗歌喻为一个“玻璃瓶邮件”,“漂向敞开者、可占领者,也许漂向一个可以对话的你,漂向一个可以对话的真实。”在他内心,诗歌有一个“走向”的过程,一个跋涉和搏斗的经过,在漂泊和流浪中,在危机与死亡中,语言能够照亮反抗与希望的目的地。流亡美国的

犹太裔哲学家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然而,策兰的出现,《死亡赋格》的写作,令他改变了态度,因为于压抑与苦痛之中发出呐喊,是情有可原甚至是值得鼓励的。

对于策兰来说,独特而微妙的德语,熟习的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等,是一生诗歌写作的实验场。他从不简单地对这些语言进行处理,而是在诗歌内部建起一个搏击和争夺的场域,表面犹如游勇散兵似的语言,逐渐从经验和思维的四周聚拢,继而破除经验语言的壁垒,最终凝聚成诗人意识的标记和精神的见证。

1970年4月20日夜晚的塞纳河波光粼粼,米拉波桥的倒影依稀可辨。策兰最后一次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后,只身来到桥上,纵身一跃。

曾与策兰通信的历史学家埃里希·卡勒认为,策兰的自杀证明,“既做一个伟大的德语诗人,又做一个在集中营阴影下成长的年轻中欧犹太人”是令人根本无法承受的重负。对于策兰而言,试图摆脱创伤是不可能的。面对绝望,然后穿越绝望,方能带着创伤展翅死亡和黑暗。

策兰的诗歌是空中的坟墓、开花的石头、死亡的赋格曲。他漂泊的一生是历史的见证。他凭借独立而丰富的灵魂,穿透时间的罅隙与现实的深渊,诉说往昔的哀愁与忧伤、暴力的恐怖与罪恶,在真实的虚空与静寂中寻找语言的极限,召唤记忆的力量,用奇崛的意象书写世间的苦难与人性的隐秘。策兰用诗歌和人生,在死亡与遗忘之间,演绎出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赌。

今天的学术研究不能食洋不化

■朱振武

近年来,乔布斯改变了人们的通讯、交流乃至阅读方式,马云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购物乃至其他许多生活方式,但我们的认知和研究方式、思维模式却没能被改变。我们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却始终见不到太多亮色,更没有什么地位可言。许多翻译人、评论人和教书人还沉浸在过时的西方文论、国外理论和写作手法之中,有的甚至把一些短时的思潮或西方学者一时的呓语误当成理论或主义。有些我们崇拜有加的所谓主义或理论连西方人自己都懵懂无知,而这些都一股脑儿地成为我们追逐、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内容。

我们还在吃洋快餐,捡洋垃圾,吃人家嚼剩下的馍,沉浸在食洋不化、甚至模仿拼贴的状态中。

前些年,我请美国教授在一家饭店的大厅吃饭,电视里的内容让他大发感慨。他不解地问,为什么电视里的表演秀类的节目总是仿效美国三四十年前甚至更久之前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这些从事文学评论和翻译研究的人,跟娱乐界有很多相似之处,许多地方都是仿效、跟风、低端模拟,甚至拷贝不走样。再拿到国际给人看,遭冷眼、冷落甚至奚落后,不思悔改,还抱怨对其不公。

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做研究,为谁

做研究,怎么做研究!我们言必称欧美,认为这样才是高大上,否则就是低矮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的引进和译介极大拓展了我们的批评视阈和思考维度,也一定程度上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的文学与文化,但同时也出现了我们的文学文化批评言必称弗洛伊德、拉康、海德格尔、萨特、巴赫金、德里达、利奥塔、赛义德等等;或某某理论或某某批评,如形式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直觉主义、存在主义、原型批评,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批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批评,不一而足。语言学不能不提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翻译学不能不提奈达和德里达,文学不能不提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不这样说似乎就落伍了,就不懂文学批评了,就不会解读作品了。但这些年来我们很多人很多时间是在为西方人的某种学说甚至是某句话做阐释,做解说,做宣传,全然迷失其中而不觉。试想,没有自我意识、特别是自主意识的文学与翻译批评还能称得上真正的批评吗?这样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能够给学界带来学术贡献吗?有些人说莫言的作品主要是学习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欧美现代主义意识流

小说,其实仔细阅读其文本,莫言向比他大300多岁的同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中国文学经典学习的东西,远超过他向欧美的前辈和同行们学习的东西。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转益多师和兼收并蓄,这才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

特里·伊格尔顿在新千年伊始就在其名著《理论之后》中反思了西方多元文论造成的危害,鲜明地指出目前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钻进了死胡同。文学批评家大卫·杰弗里曾痛心地说,后现代反权威的多元解构理论给西方文明带来的破坏比两次世界大战都严重。可见,英美等西方学者早已开始对这些话语进行了反思,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以及相关教学还在沉湎其泥淖之中不能自拔,甚至乐此不疲地鼓吹连西方人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及的某些理论。

7年前,我仔细翻阅了美国人编的语文课本(12-18岁,也就是初高中学生使用),他们的语文教科书迥异于我们这些年的语文课本。他们的重心都放在“文明的交会”“国家的诞生”“国家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繁荣”这六个板块上,选文基本上都是自己国家经典作家的作品,内容全是我们今天所提倡

的正能量。他们教育孩子的目标是让他们忠于和爱戴自己的国家。我们的一些语文课本,就像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翻译批评一样,好像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为他人做注释做宣传,培养孩子和教育学生好像是为别人别国培养似的。

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是不可分割的,两者都要从文本出发。而文学研究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也存在同样的症结——很多学人依赖甚至套用西方文论,自己的话语处于严重缺失状态;许多研究者自己不翻译,却硬要研究翻译,而且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套用人家的理论,食洋不化。

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哪个一流作家是套用某个理论去创作的?巴尔扎克还是左拉?伍尔夫还是福克纳?是莫言还是贾平凹?哪个翻译家是套用或依据某个翻译理论去翻译的?比如翻译家郑克鲁先生,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许钧先生,比如村上春树的主要译者林少华先生等等,他们套用或依据过什么理论?据说有人仔细研究之后,说他们采用了这个理论或那个理论,他们不约而同地都笑了。

唯洋是举、唯洋是尊、唯洋马首是瞻的做法可以结束了!唯俗唯矮(low)唯别人理念和标准是尊的做法可以替换了!

我们必须要有文化自信和翻译自觉,要在学习吸纳一切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打造自己的文学艺术理论包括翻译理论,要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与世界平等对话,向世界展示我们自己,使我们的研究、文学创作与翻译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